

The Chinese Vogue in Europ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8 欧洲 世纪“中国热”

许明龙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欧洲 18 世纪 “中国热”

**The Chinese Vogue in Europ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许明龙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 18 世纪中国热/许明龙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ISBN 7—5440—1856—3

I. 欧… II. 许…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欧洲—1700~1999 IV.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9450 号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晋城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70 千字 定价: 19.00 元

前 言

除去下放的年头，我在北京居住了将近四十年，其间经历了许多决定祖国命运的大事，也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热”：打鸡血热、甩手热、红茶菌热、出国热、炒股热，等等等等。赶时髦，凑热闹，大概算不得是中国人独有的习性，外国人也一样，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便是如此。那时，中国的商品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着读；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这个热，那个热，大凡称得上热的东西，通常都来得快，去得快，而且过去之后几乎不留什么痕迹。在这一点上，欧洲的“中国热”有些特别，它不仅延续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将近一百年，而且对欧洲颇产生了一些影响。就此而言，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

堪称空前。

18 世纪欧洲“中国热”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文化西传和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学西传。作为文化现象，欧洲的“中国热”大体上可以分作俗和雅两个层次。所谓俗，是指下自市井细民、上至王公贵族对中国所表现的狂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一般地说，俗层次对中国的兴趣偏重物态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但停留在比较肤浅的表面，甚至有某些误差，对中国所表现的狂热中包含有某些非理性成分。有人认为“中国热”妨碍了欧洲人对中国获得正确的认识，原因大概即在于此。俗层次的“中国热”虽然表明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仰慕和钦羡，但并未给欧洲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记，充其量只留下了一些如今成为珍贵古董的家具和工艺品。所谓雅，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雅层次的“中国热”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外，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不过，俗与雅两个层次的“中国热”虽然有区别，却并不各自独立，应该说它们是同一大潮中的两股支流，前者引发了后者，后者深化了前者。

近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成为许多学者深入研究的对象，并且已有一些有分量的专著问世。相对而言，同一时代的中学西传似乎较少引起注意。在中国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的利玛窦，早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将朱熹的《通鉴纲目》译成法文传到欧洲的冯秉正，对

许多人来说却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关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只有朱谦之先生的名著《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1985年新版更名为《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等不多的几部著作。近年出版的忻剑飞的《世界的中国观》、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等书，表明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迈出了新的步伐。但是，与西方学者在同一领域中的取得的成果相比，我们显然还有差距。

研究这段中学西传的历史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至少有三点。第一，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除了四大发明，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中再无其他令西方人倾慕的东西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中，一些人盲目崇洋和妄自菲薄的心态有所滋长，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于这种现象，叹惜和责备都无济于事，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摆出雄辩的事实，纠正偏颇的认识。通过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那时的欧洲人对于中国商品的热情，胜过如今的某些年轻人对于“耐克”、“阿迪达斯”的追求；那时的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高于今日某些中国人心中美国的地位。为什么那时的欧洲人如此看好中国？因为那时的中国不比欧洲落后。换句话说，中国不是从来就落后，落后挨打只是近一二百年的事。既然有过灿烂的往昔，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第二，为探索中国由先进变成落后的原因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材料。尽管欧洲人曾将中国奉为典范，寄托过无限的崇敬和向往，但是时隔不久，中国的形象不仅黯淡了，而且变得丑陋了。中国成了列强欺凌的对象，丧权辱国

的条约一个接一个强加给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曾几何时，昔日对中国顶礼膜拜的欧洲人，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扣到了我们头上，小脚和长辫成了洋人心中中国人的特征。帝国主义的侵略当然罪责难逃，我们自己身上难道就没有任何问题？悠久的华夏文明究竟有哪些应该扬弃，有哪些应该弘扬？第三，探索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碰撞和融合的规律。异质文化的接触是永恒的历史现象，当不同的文化发生冲撞时，短时间内也许有高下之分，但从长远来看，彼此融合是必然的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相互接触日益频繁，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借鉴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用以指导今后的行动，以便更好地把握未来。

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就 18 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而言，传教士的著述和译作，外交官、商人的回忆录和游记，当时的欧洲作家对中国的评述等等，都是我们应该细细分析的原始资料。可是，这些文献数量极大，且不说有些年代久远的外文资料无法在国内读到，纵然有机会出洋考察，也没有时间把它们哪怕仅仅浏览一遍。除了原始资料，还有大量第二手资料，其中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应该尽可能了解和掌握。朱杰勤先生翻译的德国人利奇温所著《18 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其实并非最具权威的著作，但在我国的名气却极大，频频被论者引用，原因之一是同类译著为数太少。令人欣慰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注意。近年来，中华书局组织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大帝国史》等名著，为研究者和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据说《耶稣会士书简集》正在翻译中，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翻译工作也正在筹划。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重要原

始资料的翻译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在这个学科里的研究工作。

对于并不从事专门研究的读者来说，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至今依然是一段比较陌生的历史，考虑到全面介绍这段历史的读物目前尚属罕见，所以本书以描述史实作为首要任务，尽可能真实地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的轮廓勾勒出来，以期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因此，书中叙述多于评论，介绍多于分析。当然，纯客观的叙述和介绍是不存在的，在叙述和介绍过程中，作者必然有意无意地表达了自己的某些看法。

欧洲“中国热”由盛至衰的百余年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期。在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这三位皇帝在位的百余年间堪称繁荣昌盛的辉煌时期。但是放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来看，在这百余年中，似乎没有什么超乎前人的成就可言。在物质文明方面，没有进行过堪与长城、运河媲美的伟大工程，没有出现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和造纸法那样永远令中国人自豪的伟大发明；在精神文明方面，既没有产生孔子、孟子那样万世景仰的贤哲，也没有给后人留下汉赋、唐诗、宋词那样的艺术瑰宝。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明，吸引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外来的信息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户，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地位。但是，送上门来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仅仅吹皱了一池死水，其影响始终没有越出宫廷、高级官僚、知识分子和少数天主教徒的狭小圈子，并未在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中间催发稍具规模的“西方热”。

反观欧洲，情形恰好与中国相反。中国并没有派遣传教士

前往欧洲传播华夏文明，但是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竟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对于欧洲的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热”，把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乃至市井细民全都卷入其中，令他们如痴如醉，无限向往；思想家们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商品的西去和传教士的东来，固然为欧洲的“中国热”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应该承认，这些条件并不是中国人为他们送上门去的，而是欧洲人自己主动创造的。

中国人和欧洲人对于外来文化这种迥异的反应，原因何在？但愿此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久就能听到宏论和高见。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沟通东西的媒介	(1)
一、输入欧洲的中国商品	(1)
二、东来的欧洲传教士	(8)
三、旅欧中国人	(17)
第二章 传教士和中国文化的西传	(38)
一、沟通中西的桥梁	(38)
二、“礼仪之争”	(52)
三、传教士与欧洲学者	(63)
第三章 欧洲“中国热”盛况	(78)
一、记述中国的著作	(78)
二、中国古代经籍的西译	(110)

三、“中国热”面面观····· (118)
四、中国在 18 世纪欧洲的形象····· (167)

第四章 中国文化与欧洲思想 ····· (203)
一、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赞颂 ····· (203)
二、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批判 ····· (238)
三、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的影响 ····· (267)

第五章 “中国热”降温及其原因 ····· (285)
一、在华传教事业衰落 ····· (288)
二、公众的兴趣转移 ····· (291)
三、中国形象改变 ····· (295)
四、欧洲思潮发展 ····· (300)
五、无知与偏见 ····· (312)

结束语 “中国神话”论辨析 ····· (317)

2 **参考书目** ····· (333)
后记 ····· (363)

Contents

Foreword (1)

Chapter One Link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 (1)

1. Chinese goods in Europe (1)

2. Europeans in China (8)

3. Chineses in Europe (17)

Chapter Two Missionari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Europe (38)

1. Europe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38)

2.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52)

3. Missionaries and European philosophers (63)

Chapter Three A Spectacle of the Chinese Vogue in Europe..... (78)

1. Works relating to China (78)

2.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European languages (110)

3.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Vogue in Europe (118)
4. The image of China in eighteenth century's Europe
..... (167)

Chapter Four Chinese Culture and European Thoughts
..... (203)

1. European thinkers' praise of Chinese culture
..... (203)
2. European thinkers' criticism of Chinese culture
..... (238)
3. Influence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upon European
thoughts (267)

**Chapter Five Decline of the Chinese Vogue in Europe
and its Causes** (285)

1. The decay of the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288)
2. The shift of public interests (291)
3.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image (295)
4.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thoughts (300)
5.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312)

Conclusion An Analysis of the so-called Myth of China
..... (317)

Bibliography (333)

Postscript (363)

第一章 沟通东西的媒介

一、输入欧洲的中国商品

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由于山海阻隔，交通极为不便，世界尚未形成一个整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民，仅与各自的近邻有较多往来，而与相距遥远的地区，基本上处于互不相知的状况。数百年间，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旅行家曾从欧洲到达亚洲或从亚洲到达欧洲，他们传递着弥足珍贵的信息，增进了相距万里的东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然而，这些信息中虽有旅行家们亲身经历中的大量耳闻目睹，却也掺杂着许多道听途说，乃至似是而非的传闻。凭借这些为数不多而又不甚准确的信息，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人民无法真切地了解对方。在欧洲，马可波罗游记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的人和物，令许多人为东方竟然有这样一个文明古国而惊奇。可是，也有不少人觉得难以置信，以为是作者的杜撰。18世纪的一位法国作家就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说了如下一段话：“我们关于中国的最初知识，来自著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谈到了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优秀的法律和政府，肥沃的土地，富足的生

活，繁荣的商贸，众多的居民，等等。他描绘了中国人的礼节，他们对艺术和科学的喜爱以及发展艺术和科学的热情。所有这些记述都被视为虚妄的奇谈。人们认为，这种无稽之谈与其说是事实的真实记述，不如说是善意的想象结果。人们觉得，如果相信数千里外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它胜过治理得最好的欧洲国家，那简直就是荒谬。什么！在许许多多的野蛮国家那边，在世界的尽头，会有如那位威尼斯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古老、聪慧和文明的民族？纯粹是痴人说梦，除了头脑简单的人和傻瓜，谁也不会相信。”^①从总体上看，直至 16 世纪下半叶，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中国依然只是一个抽象乃至虚幻的概念。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人对西方的无知更为严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和若干毗邻国家构成了整个“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绝不仅仅是帝王们的政治观念，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地理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它既包括南亚的印度、西亚的波斯，也包括欧洲的诸多国家。至于欧洲究竟有哪些国家，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直到 16 世纪欧洲人已经来到中国时，中国人不但依然把葡萄牙和西班牙统统称作佛朗机，而且竟然认为“佛朗机近满刺加”，“佛朗机国在爪哇南”，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从 16 世纪起，一些欧洲国家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先后开展对外扩张的殖民活动，南美洲、中美洲和亚洲成了它们首选的远征对象。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这些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一方面以其侵略性和掠夺性损害了东方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则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和

^① 鲁斯洛德絮吉：《奇趣轶闻杂录》（Rousselot de Surgy: Mélanges intéressants et curieux），第 4 卷，巴黎，1766 年，第 1-2 页。

交往。就中国而言，除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之外，与欧洲真正意义上的交往，也是从16世纪欧洲人来到中国以后开始的。

1. 欧人来华

如今我们常说，随着科技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这是说，科技进步令居住在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和往来日益方便了，从北京搭乘大型喷气客机，只消十来个小时就可抵达欧洲的任何一个重要城市。上溯数百年，那时的地球显得那么大，居住在地球两端的人们根本不具备相互了解、彼此往来的条件，以至于此端的居民丝毫不了解彼端的居民。世界虽然早就存在，而且在不断发展，然而它并不为人们所认识。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近代以前的世界史，基本上是地区史或国别史的拼凑；之所以如此，绝不是因为历史学家们无能，而是由于那时的世界尚未连成一片。

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Gama, Vasco da, 1469 - 1524）率领船队离开欧洲，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于1498年抵达印度的卡利库特，成为第一个经由海路到达印度的欧洲人，由此开辟了欧洲到亚洲的航路。同样是在1498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olomb, Christophe, 1451 - 1506）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第三次横渡大西洋，这次他终于“发现”了美洲大陆。从许多角度来看，16世纪都可视为世界历史的新开端，走出了漫长中世纪的欧洲，开始步入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新时代。1519年，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葡萄牙人麦哲伦（Magellan, Fernand de, 1480 - 1521）开始环球航行，1521年到达菲律宾，为土著居民所杀，他所率领的船队中的一艘继续航行，于1522年返抵西班牙，终于完成了环球航行。新航路的发现为

欧洲早期殖民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最早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就是在航海方面走在前面的葡萄牙。葡萄牙于 1510 年占领印度的果阿，把它变成了东方殖民地的首府，既是葡萄牙远东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控制远东天主教传教士的据点。英国和荷兰分别于 1599 年和 1602 年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从 17 世纪起为向东方扩张而与葡萄牙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而西班牙此时早已在菲律宾落脚。不久，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非洲的好望角、印度的马拉巴海岸、重要的海上通道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

随着欧洲殖民国家向亚洲和整个东方的扩展，欧、亚两大大陆之间的交往与日俱增，彼此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整体，名实相符的世界历史由此肇始。1514 年，葡萄牙商人首次航行到中国南部海面，但未能登陆。1517 年，葡萄牙商人佩雷斯·安德拉德（Andrade, Perez）进入珠江，到达广州，随行的官员皮雷斯（Pirez, Thomas）通过贿赂宦官等手段，被允许于 1520 年北上，抵达南京，翌年随明武宗进入北京；后因行为不检等原因，遭明朝政府驱赶，两手空空地返回广州。最早到达中国的西班牙人是多明我会教士拉克鲁瓦（La Croix, Gaspard de），他于 1556 年潜入广东，被发现后遭到逮捕，不久便被驱逐出境。1575 年，马尼拉教区主教、西班牙人拉达（Martin de Rada, 1533 - 1578）及一名随从和两名军官，携带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给中国官员的信件和礼物，来到福建，受到福建巡抚的接见，此后又去过同安、厦门等地。1598 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派员前往广东，要求通商，他们先到澳门，葡萄牙当局不许进泊，不得已移泊虎跳门，翌年被广东官员驱逐，无功而返。1601 年，荷兰殖民者派遣军队进攻马尼拉受挫后，转向澳门，再次受阻，于是企图进入广